

藏品:茅以升的《回忆录》

# 爱桥如命,却亲手炸毁钱塘江大桥

□ 茅玉麟

父亲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江苏南京度过的。10岁那年的端午节,秦淮河上的文德桥因看龙舟的人太多,塌了!不少人落水遇难,其中就有他的小伙伴。那天他正好生病没去,躲过一劫。第二天他跑到河边,看着断桥,想着昨天发生的惨剧,心情久久不能平静!他暗暗发誓:“我长大了,一定要造永远都不会塌的桥!”

从那以后,父亲出门看见桥就要仔细观察,在书报上看见有桥的文章、短句就抄在本子上,有桥的图画也要剪下来攒着。

后来,父亲去了国外留学,提出了著名的“茅氏定律”。毕业后曾就读的美国两所大学都希望他留下来任教,但父亲婉言谢绝:“我的事业在中国。”1920年,他24岁,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。

父亲一生爱桥如命。他曾经为建设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——钱塘江大桥付出了巨大心血!但1937年12月23日,为了阻止日军南进的速度,他亲手把这座大桥炸毁。一声巨响,这座仅通车89天的大桥轰然倒塌。他悲愤地立誓:“桥虽被炸,然抗战必胜,此桥必获重修,立此誓言,以待将来。”

父亲造桥是因为爱国,炸桥是为了民族的利益。1953年,他带领上海铁路局的工程师重建了大桥。

父亲一生在祖国的江河湖海上架设大桥,为造福人民架桥,为祖国的繁荣和国家的统一架桥。

(作者系茅以升之女)

编者按 今年5月30日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。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举办的主场活动上,依托“藏品里的科学家故事”环节,四份藏品背后的科学家往事被娓娓道来,展现了科学家的家国情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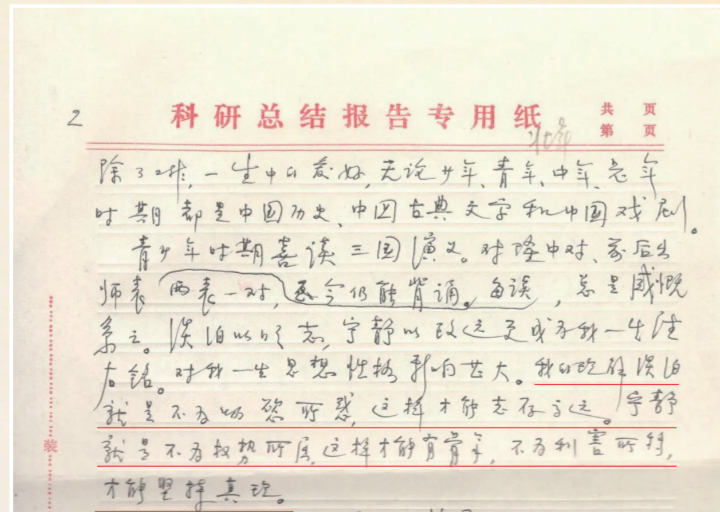
茅以升

顾方舟

于敏

李政道

于敏的手稿



藏品:顾方舟的“人民科学家”国家荣誉称号奖章

# 一生一事,为了祖国的花朵

□ 刘静

2019年9月17日,顾方舟被授予“人民科学家”国家荣誉称号。这份荣光背后的故事,还要回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。

那时,脊髓灰质炎在我国肆虐,无数孩童不幸罹病,无数家庭陷入绝望。1957年,顾方舟临危受命,扛起了攻克脊髓灰质炎的重任。

在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过程中,曾经有一位绝望的母亲背着身患脊髓灰质炎的孩子,费尽周折找到顾方舟,苦苦哀求“顾大夫,救救我的孩子,都说您能治好这个病”。可当时他只能忍痛告诉那位母亲,“现在我们无法治愈”。这位母亲坐着久久不愿离去的情景让顾方舟难以忘怀,也更加坚定了他攻坚克难的信念。为了鼓舞团队,他在实验室墙上贴出七个大字——“为了祖国的花朵!”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1960年3月,国产第一批500万人份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完成动物实验,迎来了关键的临床试验阶段。为了验证疫苗的安全性,顾方舟带头试药,确认没有异常后,他又瞒着妻子,让自己不满一岁的孩子参与试验,团队里的其他科研人员也纷纷效仿。历经一个月的观察,所有孩子都平安无恙,第一期临床试验圆满成功,后续第二期、第三期试验相继顺利完成,证实了疫苗质量安全可靠。

疫苗研发成功后,为了普及、推广,解决疫苗的储藏和运输,以及孩子们不喜欢服药的问题,顾方舟提出把液体疫苗制成糖丸活疫苗的想法。经过一年多的研究



顾方舟的“人民科学家”国家荣誉称号奖章

测试,他成功研制出了糖丸活疫苗,让全中国的孩子都能远离脊髓灰质炎。

顾方舟曾说:“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,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”。他接受这个任务时31岁,完成时已74岁。对他来说正是“一生一事”!

(作者系“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”顾方舟采集小组成员)

藏品:于敏的手稿

# 他的心里没有名利、没有攀比

□ 于辛

我的父亲于敏非常喜爱中华文化,诸葛亮的“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”更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。

手稿中有一句话是“淡泊就是不为物欲所惑,这样才能志存高远。宁静就是不为权势所屈,这样才能有骨气,不为利害所移,才能坚持真理”。他的一生,也是这样做的。

“不为物欲所惑”。家里的一张铁床陪伴他30多年,我多次想要换掉,他总说:“这个床又没有坏,我睡着也很舒服,你不要换。”

“不为权势所屈”。在科研工作中,父亲始终坚守科学规律。1971年初,曾经有人强迫他说违心的话。对此,他坚持说:“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,我也绝不同意你们的意见。因为你们的意见违背科学规律,是不行的!”

“不为利害所移”。1983年9月,在一次热核试验前夕,远在北京的父亲,突然想到一个物理因素,有可能会对这次热核试验起到破坏作用。这个时候,即使是在作业的最后阶段,他毅然向当时的国防科工委领导紧急汇报,请求暂停核试验,等搞清楚后再继续。他考虑到,如果试验失败,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,还会造成

不好的影响。

父亲一生从事国防科技研究,隐姓埋名,无怨无悔。他教育我们要淡泊名利,“一个人的名字,早晚是会没有的。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,便足以自慰了。”他和他的团队圆满完成了祖国交给他们的各项重大任务。

(作者系于敏之子)

藏品:李政道的《科学大纲》

# 一份对基础科学的深切关怀

□ 李中清

在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,有一套宝贵藏品。它,就是1922年首次出版的《科学大纲》。这套由英国科学家约翰·亚瑟·汤姆森写的科普书,是毛主席在1974年送给我父亲的礼物。

1974年,毛主席81岁,他还在思考关于科学的事情。1974年5月,父亲第二次回到中国,受到毛主席邀请,前往参加座谈。父亲担心当时国内基础科学人才培养不系统,便写了一封建议书,经老同学朱光亚转交国家领导,呼吁要尽早开始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。

当年5月30日,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父亲。毛主席一见面就说:“你的那个东西我是赞成的,应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。”毛主席和父亲讨论科学时,父亲提到自己年轻时读过《科学大纲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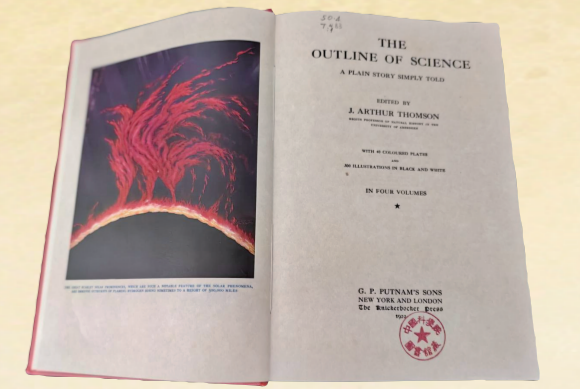
没想到,第二天,毛主席就安排中国科学院把这套书送给父亲。当时父亲接到书时,他已经身在首都机场,飞机也快要起飞。回到美国后,父亲让我在书店找两套书,一套还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,一套赠予毛主席。后来,我父亲把毛主席送的这套书捐赠给上海交通大学。

今年4月30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

会上强调,要以更大力度、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,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,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。这跟当年毛主席重视基础科学一样。因为学“问”比学“答”更为重要。

这套书不仅见证了伟人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,更反映中国从过去到现在,对基础科学与青年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。重温这段历史,希望青年学生同样重视科学,懂得学“问”。

(作者系李政道之子)



李政道的《科学大纲》